



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
FIFTH EDITION

大学之用

(第五版)



[美] 克拉克·克尔/著

高 钰 高 戈 汐 汐/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05-465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之用:第5版/(美)克尔著;高钰,高戈,汐汐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10

(北大高等教育文库·大学之忧丛书)

ISBN 978-7-301-13960-8

I. 大… II. ①克…②高…③高…④汐… III. 高等学校-教育史-研究-西方国家
IV. G64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88179号

Copyright © 1963, 1972, 1982, 1995 and 2000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5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大学之用(第五版)

著作责任者: [美]克拉克·克尔 著 高钰 高戈 汐汐 译

责任编辑: 周志刚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3960-8/G·239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jycb.org>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zyl@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6

出版部 62754962

印刷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14.25印张 170千字

2008年10月第1版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丛 书 序

刘 东



(一)

审读《大学之用》、《废墟中的大学》、《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底线》这几部忧患当代大学命运的译稿时，偏偏赶上电视台的哪个频道，也正连篇累牍地播放着宣传国外知名学府的系列节目——照例是一路的天花乱坠，仿佛下界仰望着天国。

这种可巧插播在高考之后的追捧，明眼人一望便知，肯定是迎合了强烈的牟利动机。不过，首先引起我关注的，还不是它那骨子里的“学店”做派，而是装潢在其表面的、很少引起公众怀疑的神圣性。就冲这种煞有介事的神圣性，我简直有些不忍地念及：在这个空空如也的时代，就别再去撕破家长们仅存的虔诚了吧？试想，除了大学、重点大学乃至海外著名大学这种拾级而上的现代殿堂，他们还能想出什么更庄严的所在，来砥砺自家小孩子苦其心志呢？

我甚至还愿意宽容地理解：在大众的心理中，大学这般地受到迷信，不光因其在理想的维度中，曾经充填了少年时代的童稚幻想，还更因其在现实的层面中，往往构成了人生履历的实际转折。借助于现代高等教育机构跟整个社会权力结构的共谋关系，任何一个跃过这道龙门的人，都有可能得到一次真正的提拔，从此好官得做，骏马任骑。正因为如此，一代又一代的校友，天然地就会充当母校的终身粉丝，这里既有心理学的基础，也有社会学的考量。

要是事情仅限于此，一切都还算罢了。不过，要是这类神话并非来自大众传媒，而是来自我们学院的内部，把一个寻常吃喝拉撒的所在，说成是“到处莺歌燕舞”的庙堂，那就叫人很难忍受了——正好比遭遇到一位私心过重的寺院住持，老在那里不遗余力地公关，煽动别人往自己的荷包里进香。尤其是，一旦谈到海外的名牌大学，最怕的就是那些学成（甚至



半成)归来的留学生,学着母校招生手册的宣传口径,把别人的往好里说也只是指望将来能够实现的目标,鼓吹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实——由此一来,仅仅因为个别人物对于蝇头小利的贪图,而揣着明白装糊涂,整个的改革方向就被弄得模糊不清了。

孩子们长大后自会晓得:即使出息成了大学教授,也很难一味清高地过活,仍要身陷于章鱼吸盘般的体制中,仍要属于吃拿官饷的工薪阶层。由此说来,如果只从利己的立场算计,既然在俗常的神话中,这高楼深院已被说成仙境一般,那么索性假冒一回得道的神仙,而乐得自在快活,又有何妨?正是缘此,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国内的书市上,到处都充斥着宣扬大学之道、大学理念、大学作为之类的豪迈图书。

然而,尽管不能全然自由漂浮,大学教授作为知识分子,总还要保留以批判为业的一面罢?否则这个阶层就会彻底沦为社会的盲肠,就会变得生不如死。正因为这一点,只要稍微环顾一下海外的书市,我们就不难发现,恰恰是围绕着作为大众神话的高等教育,特别是那些被吹得神乎其神的国际知名学府,我们的海外同行们,反而发出了广泛而持续的批判。就此,不妨引用一下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在其近著中的描述:

教授们——差不多全都来自人文学科——也开始发表各自的文章。下述书籍的标题抓住了其主要的论调:《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废墟中的大学》、《道德沦丧的大学》、《终身职的激进派》、《反智战争》、《圣殿里的冒牌货》、《扼杀精神》。……这些作者在意识形态方面并无认同,其关切点也不尽相同。然而,他们笔下仍有些共通的特征。几乎所有的锋芒,都指向了顶尖的研究型大学,而不是泛泛而谈本科院校。这些著作又主要是论争性的,在谈到大学及其教授时,很少讲什么好话。^①

于是我们看到,原来我们在国外的同行,并没有习惯于这么可着劲儿自吹。恰恰相反,他们干脆就耻于宣喻什么“大学之道”,而宁可“卖瓜的不说瓜甜”,径直表达出心中的“大学之忧”。说到这里,我们就真该相互对照一下了:究竟哪边的情况才稍属正常一点?总听见人们嚷嚷着,要学习国际先进文化,要争创国际一流大学,怎么没见到先在广开言路方面,引进一点国外校园里里不可或缺的活跃风气?

幸而,我们在思想的宽容度上,总算还保有一个例外——那还要数我

^① Derek Bok: *Our Underachieving Colleges: A Candid Look at How Much Students Learn and Why They Should Be Learning More*, pp. 1—2,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并请参对其中文译本,德雷克·博克:《回归大学之道:对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反思与展望》,侯定凯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目前任教的这所学校。拜民国初年流传下来的(虽已相当残缺的)传统之赐^①,如今大约也只有在这所学校里,如果真你感觉到了刺痛,才敢扯着嗓子真把伤害给喊出来。眼下回想起来,五年前那场有关北大改革的争论,看似“说了也白说”,却并不是毫无遗产的:它就此激活了有关大学命运的普遍忧思。以往,大学里的种种规则和潜规则,打我们来此求学的第一天起,就被视作了天经地义,正所谓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即使后来毕生留存于此,做了一辈子的学术研究,大家好像也未曾想到,要把它本身当作批判研究的对象。可自那以后,人们逐渐发现,必须睁大眼睛,去警惕种种类似这样的改革!

其实当年把 reform 一词译成“改良”时,这个字眼还受到过激进主义的猛烈批判。可晚近以来,在主流意识形态支配下,这个词的中文对称,天然就属于政治正确,只能意味着“改良”或“改好”。而殊不知,所谓 reform,无非意味着人为追求的某种“变迁”,其本身并不曾蕴含价值前提。所以,如果从其历史后效来判断,人们的“改革”行为,的确是既有可能“改良”,也有可能“改劣”的。说穿了,如果这种行为从一开始就定错了目标,或者更有甚者,如果这种行为从一开始就没有定下目标,只是随波逐流地走一步算一步,那是完全是有可能“摸着石头过不了河”的!

这正是我撰写那篇《保护大学生态》的起因。正是由于痛感到在当下的舆论环境中,“任何心血来潮的改革,朝令夕改的改革,机械照搬的改革,伤筋动骨的改革,都有可能被赋予某种天然的合法性,即使它们并不能被基于常识来理解,甚至正因为它们不能被基于常识来理解”^②,我才忍不住要向人们提醒:决不可只顾兜售经济学的“丛林原则”,而毒化了校园里超越功利的研讨氛围:

改革作为一项复杂的和系统的工程,其间所蕴含的规律绝非仅靠经济学家的简单成本核算就能廓清。如果改革的进路果真是如此单向度的,那么即使它按照自己的预期而获得了成功,也很可能造成这样一种糟糕和被动的局面:以后凡是能在大学里站住脚的个人,都可以算是在激烈竞争中成功了,而唯独作为这些个体之集合的学校,其本身反而在相互厮杀中失败了。因为这里将只表现为一个熙熙攘攘的知识集市,而不再是一个相濡以沫的知识社群,充斥在这里的也

① 参阅 Timothy Weston, *The Power of Position, Beijing University, Intellectuals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1898—192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② 刘东:《保护大学生态》,《书城》杂志,2003年第8期。

将只是知识摊位之间的尖利叫卖声,而不再是研究过程中无功利的共享快乐。^①

回想起来,自己撰写这篇文章时,比起较早前写作《社科院的自我理由》时,对于只拿经济模型来简化大学构造的做法,无疑有了更多的切肤之痛。当年身在社科院的时候,由于准官场的弊端太过触目惊心,使我尽管同样在警示照搬美国的危险,仍然感到能找到一些理由,来肯定大学这个“制造人才”的准市场。而调入北大以后,短暂的“忆苦思甜期”一旦过去,新的桎梏形式马上又凸显出来,而且主要就表现在无孔不入的市场原则上。不错,我确实说过——如果命中注定非要受气不可的话,那么我宁愿受市场的气,也不愿受官场的气!然而,这却并不意味着,这种认定了无论什么都可以作价交易的经济等式,这种把任何东西都要简单还原成数字价签的如意算盘,就不会把我们像傻瓜一样奴役和愚弄。哈佛大学原校长德里克·博克当做黑色幽默构想出来的一串噩梦^②,或许正说明了,在我们大家的日常经验中,沿着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逻辑,噩梦和现实的边界已经相当模糊了,比如前些时爆出的浙大教授包伟民由于交不起“助研经费”而放弃招收博士生的故事,其荒唐的程度就绝对不下于德里克·博克的噩梦。^③

(二)

在《保护大学生态》那篇文章中,我曾经表达过挽歌般的守旧情调:

尽管传统已然淡薄而且越变越薄,然而仍是北大传承已久的学术环境,而不是被看得如此万能的金钱,才是这所学校最为贵重的无形资产。它不仅足以使它的一位并不宽裕的文科教授几乎不假思索就会婉拒其他学校允诺提供的高达数倍以上的岗位津贴,而且还足以使它的一位并未腾达的法学教授绝非故作惊人之语地在电视节目坦承天下所有的工作岗位包括担任共和国主席在内对自己都没有吸引力。正因为如此,我在这里要一反俗见地进行提醒:其实比任何改革都更加要紧的是,这所学校首先需要的毋宁是保守,是对于传统学术生态的最为精心的环境保护!^④

① 刘东:《保护大学生态》,《书城》杂志,2003年第8期。

② Derek Bok, *University in the Marketplace: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p. IX,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博克在书中写到自己做了一个噩梦,梦到一个金融家校友要他同意取消哈佛最后100名本科生的入学资格,进行拍卖来赚钱。

③ 《浙大规定导师招研究生须交钱 教授声明拒招》,载2007年3月23日《中国青年报》。

④ 刘东:《保护大学生态》,《书城》杂志,2003年第8期。

也许用不着再来说明：上述说法决不意味着，我本人已对周遭的环境感到心满意足了。恰恰相反，正因为发现身边那些值得保守的东西，不单是日渐稀少，而且还在加速流失，我才不由发出失落的恋旧之情。

的确，怀旧本身就有可能是一种力量——例如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在这所校园里提到蔡元培的名字，都至少会感到一种制衡。不过，此后的事态发展，以及伴随着这些事态而来的、不厌其烦却又于事无补的老生常谈，却又在另一方面提醒了我——我们必须警惕这样的陷阱：一旦谈论起大学来，哪怕姿态最激进的学者，都会随手掏出一套喋喋不休的怀旧说辞来，似乎这种教育机构最初在理性的设计下，确曾享有过某种莫须有的黄金岁月，而此后便只能是无可挽回的堕落了。

尤其在所谓“大学理念”的问题上，情况更加严重。大家早已见惯不怪的是，一旦谈论起大学来，即使是那些自称从没把自由主义价值放在眼里的学者，也马上要祭起所谓 liberal education 的大旗，而忘了无论借着它的历史语境而把这个英文表达发挥成“博雅教育”还是“通识教育”，其实都掩盖不了它最原初最结实的本意——“自由教育”。同样讽刺的是，一旦谈论起大学来，即使是那些自称最反感抗拒西方霸权的学者，也马上要端出约翰·纽曼的“大学理念”来，而忘了那位英国红衣主教原本只认定了大学的使命是要在罗马天主教的精神之内提供知识，故而预埋了强烈而褊狭的西方文化之根。

正如维多利亚时代其他大多数重要作家一样，纽曼相信真理的一致性，拒绝道德和文化相对主义在早期的侵入，以及它们后来必然会造成的普遍担心与怀疑。纽曼也展示了一种诚心诚意的（如果不是激烈的话）种族中心观点。“文明”对他而言，几乎没有超出地中海世界的疆域与文化。他与同时代人一起，毫不犹豫地采用了一些帝国主义的比喻，他骄傲地把大学描绘为伟大的“帝国的心智”，把它比喻为一个帝国。^①

从思想方法上说，凡此种种都显然是忽略了下述要害：西方文明的演进史，包括其不断演变的教育史，究竟是一种开放的、偶发的和多元的进路，还是仅仅为某种恒准单一之理念的前定展开？从而，liberal education 究竟是从创世纪之初，就已然先行确立的普适恒常的文明理式，还是经过长期历史斗争和利益博弈才产生出来的解决方案？进而，考虑到不断分工、科层和分化的人类现状，以及施行 liberal education 的昂贵成本，这种教育究竟是普适于整个社会还是专属于绅士阶层？最后，尽管这种自由教育看

^① 弗兰克·M. 特纳：《纽曼的大学与我们的大学》，收入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念》，第314页，高师宁等译，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3年。

起来似乎相当靠近西方的理想,但它自身究竟还有没有被哪怕是扬弃式发展的余地?……

正因为这样,必须警惕这样一种本质主义的倾向:一旦谈论起大学,总是贪图省事不假思索地以不变应万变——误以为只要从西方文明的源头略加寻索,就准能在那里找到必然预制好的万应良药来;甚至,即使很显然当代西方本身在教育实践中已经把那些理念弃而不用了,也仍然刻舟求剑地认为:只要能坚持表现得比西方还要西方,就一定会医治好当代中国的大学。

比如,还是从那个借 liberal education 一语自由发挥出来的所谓“通识教育”谈起。尽管这个概念近来被大大复活吹得山响,可到底有多少人认真研读过前哈佛学院院长哈瑞·刘易斯从这种教育之最常被提起和效仿的“标准模板”中发出的哀叹?

但是时代在变化。教授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师一茬接一茬。新一代的教师并不认同前辈教师的理想。通识教育课程的内在逻辑已不复存在,它已经成为了各系安置没有能力上专业课的教师的“垃圾场”(dumping ground)。越南战争、美国种族冲突,以及随之而起的哈佛校园暴动,使原本奄奄一息的通识教育课程雪上加霜。^①

与此相连,尽管总是听到有人把北大比作“中国的哈佛”,但到底又有多少人真正敏感到了——如今正是在哈佛那块“标准模板”中实施的教育试验,实际上已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纽曼主教当年所圈定的范围。也就是说,尽管我们这边还频频有人对哈佛的“通识教育”大唱赞歌,但人家那边实际早已意识到了——在文明冲突和文化交流的当代背景下,一种仅仅旨在复制和灌输西方文明之前理解的 liberal education,还很难说是真正自由的或全面解放的。

通过回顾历史,科比(即中国历史专家柯伟林,时任哈佛文理学院院长——引者注)和哈佛学院院长本尼迪克特·格劳斯提出,哈佛需要提高课程的全球化和国际化水平。“1940年代的‘红皮书’意在阐明作为‘自由社会公民’,哈佛学生应该接受怎样的教育;现在我们的教育目标则是将学生培养成为全球化社会的公民。”^②

这真是一个黑漆漆的三岔口!人们甚至都不打算弄清挑战来自何方,就摆出招式伸出拳脚想要应战。也就是说,他们根本没有认真考察过

^① 哈瑞·刘易斯:《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第47页,侯定凯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② 同上书,第49页。

别人究竟遭遇到了怎样的当代忧虑,以及究竟是沿着什么样的历史线索,才引发出了今天的这番忧虑,就基于其先入为主的西学崇拜,而张扬起别人已被瓦解的早年理想了——充其量到头来也只能基于这种遥远的理想,捎带着莫名其妙地埋怨一下“西方竟然今不如昔”这样隔靴搔痒的空疏议论,姑妄听之也就罢了,要是真想用来祛疾伐病,那还不耽误了大事!

当然,指出美国的大学正面临着令人担忧的危机,故而与其从西方的图书中引进迂远的“大学之道”,倒不如从中引进切近的“大学之忧”,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由此就不再承认大洋彼岸值得借鉴的优长;相反,倒应该相当坦率地承认,美国大学的这种巨大优势,简直就是独步全球的!在这方面,完全可以引证哈佛大学前文理学院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的那段既出语惊人又并不过分的说法:

当外国经济竞争对手似乎在一个接一个的领域里超过我们的日子里,可以再次保证确信一点:美国毫无问题地主宰世界的一个重大的产业,那就是高等教育。世界上2/3到3/4的最好大学是在美国。这个事实是最近对美国高等教育展开批评的许多人所忽略的。……我们处在高等教育质量表上的高端地位是非同一般的,它可能是一项特殊的国家资产,需要加以说明。^①

所以,要害就并不在于是否应当向人家学习,而在于到底如何学习。正因为这样,同时也是鉴于人们动辄就“哈佛长、哈佛短”的多年积习,这里索性就主要从哈佛大学出版社的书目中,选择介绍了一些相关的书籍,以便帮助读者更加细致真切地既去了解人家成功的经验,也去体验人家失利的困扰,既去记住人家光荣的历程,也去洞悉人家今后的路径。唯其如此,我们才有可能避免下述尴尬——自己正大张旗鼓亦步亦趋地想要学习的,偏巧是人家最感到头疼的、正不知如何摆脱的痛处。

比如,针对上面提到的前哈佛学院院长哈瑞·刘易斯的《失去灵魂的卓越》一书,马萨·诺斯鲍姆这样批评道:

但是哈佛确实存在一个大问题,……这就是哈佛要求所有的终身职申请者都必须经由国际搜索,通过包括外请专家的专门委员会,所以相比起其他同等大学来……其校内教师能够获得终身职的人数实在是太少了。芝加哥大学向50%和60%的文理科教师授以终身职。而在哈佛,这个数字有段时期曾经接近5%……相反,哈佛典型的做法是把年轻教师请走,再把处于学术生涯较晚阶段的人请来。

^① 转引自克拉克·克尔:《大学之用》(第五版),高铨等译,第12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那些终身职授予率较高的大学,比如密歇根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在院系质量上相当出色。更加明显的是,哈佛的政策反使它自己得不到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处于创造高峰的年轻学者。正是缘此,许多年轻人将会发现,他们可以在很多优秀的文理学院受到比哈佛更好的自由教育,那些学校在给予年轻老师以终身职时,要比哈佛或其他名牌大学更为慷慨。^①

这种困扰,凡是访问过哈佛的同事谅必都心知肚明吧?然而,我们如果拿上述文字,来对照一下上次围绕北大改革事件所发出的激辩,却又不难发现,当时敝校比照哈佛制定出来的“一个学生不留”的改革政策,真可以说是不折不扣地学到了人家的“肚子疼”:

仅就我本人的专业领域而言,如果老是这么得意洋洋地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文科状元一个都不少地震括进来,又不声不响地不那么光荣地几乎一个不剩地全给送了出去,那么我们这所学校的地位就别提有多尴尬了:一方面,它至少在全国的中小学师生的心目中,总显得是一所高不可攀的“超级牛校”,足以权威地验收应试教育的最终成果;另一方面,它又有可能在学术国际化的巨大压力下,悄然沦为基层的或地区的某种“业余体校”,无非在帮着国外同行选拔和培养一些苗子而已。

于是,这种“集天下英才而送走之”的窘境,就给了我们一个不言而喻的有效判断标准——任何有利于提高学生水准特别是研究生水准的改革方案(比如对研究生实行“硕博连读”的稳定学制甚至干脆取消独立的硕士阶段),肯定是切中要害的;而任何明里暗里继续把同学们往国外撵的改革方案(比如不顾国情校情地照搬凡毕业生无论优劣均不得留校的普泛规定),都属于火上浇油。^②

所以,正像那个可笑的、原以为不大可能发生在现实中的古老故事所示:人家西施只不过是害病,只有闹到东施这里,才会被闹成一种效仿的时尚。

(三)

原拟收入这个系列中的论著,有些已被别家出版社(包括台湾的)买

^① Martha Nussbaum, “An overhyped Harvard?”, <http://tls.timesonline.co.uk/article/0,25351-2266728,00.html>.

^② 刘东:《保护大学生态》,《书城》杂志,2003年第8期。

走了版权,有些则到现在还未能谈定版权,这里只能先谈首批做完的这三本书。幸而,简直有些碰巧的是,即使只从这寥寥数册的内容,也能略窥到美国大学历程的起承转合。

首先要谈的是克拉克·克尔的《大学之用》。要是我们基于如此之少的选题,还奢望能勾出一条相对清晰的历史线索,甚至从中还能见出忧思的连续性,那首先就要归功于这本书。事实上,后边的两本书都会反复提到它,仿佛在重弹着某个关键的主题。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既可以算作名声最坏的箭靶,又可以算作最绕不过去的路碑。

我看,恐怕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这本书才会在其本土不断地重印,而等我们从哈佛大学出版社引进时,它已经在发行第五版了。正是在它的最后一版的前言中,借助于长达40年时光的检验,这位前加州大学校长更加充满自信地回顾道:

我在1963年哈佛大学所作的戈德金讲演中说,“美国的大学正处在历史的转折点:虽然维系着往昔,却正在摆向另一个方向”。我想我知道它当时正在摆向何处,而历史已经证明我总的说来是对的,我当时正瞩目于20世纪末的远眺。^①

那么,克尔究竟在半个多世纪之前,敏感到了怎样的不可逆的位移呢?我们看到,他在此书的历史描述中,是分别以现代大学演变的三个阶段,来对应其存在状态的三种模式,也即早先的英国模式、此后的德国模式和晚近的美国模式;或者干脆不妨说,是近代的纽曼模式、现代的洪堡模式和当代的克尔模式。

把“大学的理念”表达得最好的或许是红衣主教纽曼在一个多世纪以前从事建立都柏林大学时所说的话。他的观点反映了当时他所在的牛津大学。红衣主教纽曼写道,一个大学是“一切知识与科学、事实与原则、探究与发现、实验与思辨的至高保护力;它划出才智的领域,使任何一方既不侵犯也不投降”。他赞成“博雅知识”(liberal knowledge),说有用的知识是“一堆糟粕”。^②

这种高雅的信条对我们来说,尽管从未普遍施行过,却是最为耳熟能详的。我们甚至不难猜想,当蔡元培把大学定义为“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时,当他认定“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③

① 克拉克·克尔:《大学之用》(第五版),高铨等译,第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② 同上书,第3页。

③ 《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第291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

时,当他把原属北大的工科放逐到北洋大学时,我们的老校长心中念兹在兹的,大体上也正是类似的理念。也许正因为这样,如今在坊间才会到处都在复述它的教义,觉得这反正是最不会出错的。然而却没想到,克尔旋即就向我们指出,恰在纽曼以其熟知的牛津大学为底本,美轮美奂地描绘着大学的英国模式的同时,这种模式实则行将为德国模式所覆盖:

很清楚,1930年时“大学已经发生了深远的变化——通常朝着它们所参与的社会演变的方向”。这种演变使系科成为大学,出现新的系科;越来越多的研究所出现了;成立了巨大的研究型图书馆;把进行思索的哲学家变成实验室里或者图书馆书库里的研究者;从专业人员手里取来的药物交给科学家之手;等等。不是关心学生个体,而是关注社会的需要,不是纽曼的“自然规律的永恒真实性”,而是新事物的发现;不是多面手,而是专门家。在弗莱克纳斯的话里,大学成为“一个有意识地致力于追求知识、解决问题、鉴别成就以及培训真正高水平人才的机构”。一个人不再可能“精通一切”——纽曼的万能通才人物一去不复返了。^①

如果你愿意坚守原有的价值,当然有理由指斥这种变异,认为它不是上升反而是坠落,偏离了通识教育的树人方向。不过,历史无可争辩的另一面却是,德国的国力居然因此而大大增强了。正如前哈佛文理学院院长柯伟林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所描述的:“在大约一个世纪之前,当中国着手放弃那个迟至18世纪仍被西方人看做是使中国成为教化大国和启蒙先锋的古代科举制度的时候,几乎所有世界上的顶尖大学都在德国,它们是德国19世纪伟大高等教育改革的产物。”^②

尤有甚者,历史之江河日下的变化速率,还有更加教人瞠目结舌的:接下来克尔又笔锋一转,充满戏剧性地指出——“正当弗莱克斯纳写到‘现代大学’的时候,它却又不存在了。洪堡的柏林大学正在被玷污,就像柏林大学曾经玷污牛津大学的灵魂那样”!

到了1930年,美国的大学已经远远脱离了弗莱克斯纳的“以文理科研究生院为中心的、有坚实专科学院(在美国主要是医学院和法学院)及某些研究所”的“现代大学”。它们正越来越不像“真正的大学”——所谓“真正的大学”,弗莱克斯纳指的是“一种以崇高和明确的宗旨和以精神与目的的统一为特点的机体”。当弗莱克斯纳在1930年写到“现代大学”时,现代大学以及几乎死亡,就像老牛津大

① 克拉克·克尔:《大学之用》(第五版),高铨等译,第4—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② 柯伟林:《关于中国、欧洲和美国的大学》,陈时伟译,原载 *Daedalus*, Summer, 2008。

学在1852年被纽曼理想化时那样。历史发展快于观察家的手笔。古代经典和神学以及德国的哲学家和科学家都不能为真正现代的大学——巨型大学(multiversity)——定下调子。^①

上文中的 multiversity 一词,曾在中文里被对译为巨型大学、多科大学、多元化巨型大学,甚至是综集大学,似乎都还嫌不够到位。不过,这里至少可以借助实际执掌过大学的香港学者金耀基的大段综述,来大体把握这种 multiversity 的基本特征:

当代的美国大学,如克尔所指出,早已越出了德、英的模式,而发展出自我的性格。美国的大学狂热地求新,求适应社会之变,求赶上时代,大学已经彻底地参与到社会中去。由于知识的爆炸及社会各业发展对知识之倚赖与需要,大学已成为“知识工业”(knowledge industry)之重地。学术与市场已经结合,大学已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社会的“服务站”。……大学内部则学生可以多达五六万,甚至十万以上;学术之专化更是惊人,如整个加州大学课程之多竟达一万门之数,不但隔行如隔山,即使同行的人也是无法作有意义的交流。而教授之用心着力所在多系研究,教学则越来越被忽视。教授的忠诚对象已不是大学,毋宁是支持他研究的福特基金会、西屋公司或华盛顿。一个教授所关心的不是他隔壁他行的同事的评价,而是其他大学乃至其他国家的大学的同行的评价。大学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它的成员已不限于传统的教师、行政人员和学生,还包括许多“非教师”的教学人员(如研究教授),它的组织已不止限于学院(faculty)、书院(college),还包括无数的研究中心、出版社、交换计划中心……它的活动已不止限于研究、教学,还包括对外的咨询,与国外的合作(加州大学的研究计划涉及五十几个国家)等等。总之,在数量、组织、成员、活动各方面,今日美国的大学与以前的大学已大大不同。这种大学的理念及性格与纽曼的构想固然相去十万八千里,与弗莱克斯纳、雅斯贝尔斯的构想也迥然有别。克尔认为纽曼心目中的大学只是一“乡村”,弗莱克斯纳心目中的大学也只是一“市镇”,而当代的大学则是一五光十色的“城市”了。^②

这不是更加礼崩乐坏,更加杂乱无序,更加不成体统了么?只要愿意,你当然也有理由这么说。然而你同样要留意,明摆着的另一面却又是,就在它们焚琴煮鹤地舍弃了如此可爱的“鱼”的同时,务求实用效果

① 克拉克·克尔:《大学之用》(第五版),高钰等译,第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② 金耀基:《大学之理念》,第7—9页,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

的当代美国大学，偏又令人艳羡地抓到了如此可欲的“熊掌”！让我们再来听听每年公布的诺贝尔奖名单，查查每年发表的全球大学排行榜，数数拥有各个学科之顶尖教授的数量，看看过江之鲫一般排在使馆前等待签证的留美预备生，瞧瞧美国名牌大学所能提供的校园、设备和待遇……又有哪一样不让别国的大学校长眼红得出血？由此你总应该平心地承认，哪怕所有这些成功都有局限，所有这些获得都要付出代价，但成功终归还是成功罢？

再来盘点一下如此令人目眩的变迁。克尔笔下那个与传统指向渐行渐远的钟摆，大约是划出了这样的偏转弧线：

重心究竟在于培养学生——还是由教师进行研究示范？

学生究竟应当被教导成完人——还是被培训成技术性专才？

范围究竟要旁及到博雅通识——还是锁定在偏科发展？

检验标准究竟是教学效果——还是承揽科研项目的数目？

教授地位取决于学术水准——还是资金募集的能力？

氛围究竟应当尽量超脱——还是鼓励功利与实用？

校园究竟应当单纯而寂静——还是显得嘈杂而活跃？

规模究竟应当有所控制——还是能发展多大就多大？

学校究竟属于有机社群——还是杂糅而成的知识集市？

大学究竟应当尽量自治——还是密切联系国家与财团？

办学究竟突出科技发明——还是倚重历史与人文底蕴？

教师应像个探索型的学究——还是管理型的知识老板？

校长应做个学术人格的楷模——还是掌管知识机器的官僚？

应该基于理念去因应外部变化——还是根据外部变化来调适理念？

有趣的是，不管读者是否喜欢这些变化，他们总有可能发现，其实这种似曾相识的滑落，正是每天都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的确，我在这里也很愿意坦率地承认：诸如此类的归纳总结，也不光是阅读和出访的结果，还同样参验了切近的事实。这也就意味着，尽管召唤“大学理念”的呼声向来都未绝于耳，然而中国大学的实际发展轨迹，却偏偏是朝着这个老鼠过街的方向伸延的！

事实上，就连克尔本人也表白说，他并不乐见这样一种发展：

我在1963年的演说成了学生活跃分子的靶子。他们不喜欢我所描述的新的大学世界。学生们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也是不喜欢这个新世界的病态的，而且是其最早和主要的批评者。“巨型大学”成了“克拉克·克尔的巨怪”。甚至暗指我是“典型的法西斯主

义理论家”。人们可能会认为一个大学校长的明智做法是什么也不要写,或者要写的话就只写些老生常谈。我为了当一名诚实和现实的评论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然而,读者如果细读该书一定会发现,尽管作者本人也为此种不知所终的变化而感到眩晕,却又总是在很多章节的末端,不大协调地换一种语气说,当下的变化毕竟已扎根于历史,而且现行的大学也自有种种好处……正因为这样,动不动就指责教师们太过保守,故而无力或不愿顺应势在必行的变革,也就成了此书经常采取的姿态。当然,缘此也就不难理解,克尔和他的这本书,准保会在知识阶层特别是在校师生中犯下众怒:

20世纪60年代的混乱,显然标志着大学的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1963年由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所写的《大学之用》,既是此一变化的一个原因,又是它的一个效果。他的“巨型大学”是第一个直言不讳的宣言,是要放弃大学作为一般公众的阐释代理人的本色,如果不是“普遍的”公众的阐释代理人的话。现在大学被重新认为是各个社会部门的服务站,其中最重要的——或者说唯一重要的社会部门,就是国家机器和公司。除了别的之外,对这本书的反应还导致了一场学生造反,即在伯克利的言论自由运动,但克尔校长的“多科大学”的思想也标志着大学的应负责任的开始,那不仅是应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公众(国家据说就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公众)负责任,而且也应对社会里的多职能的力量负责任,那些力量比大多数公民更直接地控制着国家。^①

平心而论,虽说我们可以同情地理解,作为实际掌管着一所顶尖大学的领导者,作者观察问题的角度肯定会有其独到之处,但如果跟同样掌管着著名大学、也同样勤于论述大学的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相比,克尔在道德和功用的两极之间,显然还是更加偏向于后者——尽管同样赞成“超越象牙塔”的博克,还特别在《大学之用》的封底表彰说,“从未有别的著作能对现代研究型大学提供如此具有穿透力的描述,或是对其特有的紧张和问题提出如此具有洞见的评论”。

不管怎么说,相形之下,博克本人的平衡感要好得多(当然他的论点因而也就显得模糊得多):

毫无疑问,教师们习惯于通过各种校外活动来弥补自己收入的不足。然而,技术开发工作的需求给校园带来某种更强有力的影响,

^① 三好将夫:《“全球化”、文化与大学》,收入王逢振(主编):《美国大学批判》,王义国译,第169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

与学术研究工作的关系越密切,对大学的价值观念的影响也就越大。当然,由此造成的影响要大大超过大学教师们惯常所能考虑到的程度。……面对差异如此巨大的利益,学术研究的本质和方向可能会发生变化,会变得颇不同于长期以来鼓励大学教师无私探索知识的精神。总之,技术转让领域出现的问题之所以令人不安,不仅仅是因为它可能会改变大学内学术研究的惯例,而且还因为它对学术研究的中心价值观念和理想构成了威胁。^①

上述的种种忧虑,或许也就部分解释了我在这十几年前提出的困惑:

再说,尽管美国的知识生产体系财大气粗,谁又道它全无问题?如果不是盲目崇信的话,那么撇开自然科学和狭义社会科学不谈,至少就我本人的专业视野而言,任何人文学者在哈佛周围的书店里逛久了,都难保不会暗呼蹊跷——何以美国拥有那么多功力深厚的同行,但将其全部知识原创性迭加在一起,却远远及不上一个小小的巴黎?我迄今没能想清其中的原委,弄不懂这究竟是由“缺乏历史传统”所致,还是由“职业化过度”所致,抑或由“太过贴近市民社会”所致?然则成因虽属待考,收效却是明摆在那里的——他们漂在钱海里的人文学科,尽管成绩无疑卓著斐然,尽管一流学者多如恒河沙数,却鲜能涌现世界水平的“超一流”学者,而往往要甘当欧洲学术成果的“二级市场”……^②

那么,事态为什么发展得如此无奈?大学的船队何以会在所有船员都为之惊呼的情况下,仍然驶往那个由克尔率先发现的可人人都并不想去的方向?其根本的原因,当然还在汹涌于船下的现代化激流。肇始于西方、波及于全球的现代性生活方式,正未有穷期地增强着全世界的社会整合。由此,西方的大学从它的英国模式,一变而为德国模式,再变而为美国模式,并且步步进逼地一再要求非西方国家拷贝它,这本身就是现代性的征兆之一,本身就相当符合现代生活的自身逻辑。如果在由现代消费激发出来的无边物欲的推动下,知识仅仅被看做一种力量,而且科技知识则又被看做第一生产力,那么,大学作为知识的重镇就势必要被转化成这种生产力的关键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只要现代性的生活形式继续在主宰我们,传统的大学形式就势必会被不断地突破,直到它发展为美国式的巨型大学,乃至比这种巨型大学还要庞杂的、更加无以名之的大学,以

^① 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第160页,徐小洲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② 刘东:《社科院的自我理由》,载刘东:《理论与心智》,第22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便能够装填入新的能量、呼唤出新的产出，哪怕大学的肚子终将因为过多的吞噬而被撑破！

由此可见，尽管对于通识教育的茫然吁求，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至少也还不无部分的平衡作用，然而说穿了，如果对这种英国绅士派头的热衷，只不过是出于某种盲人瞎马的激情，或者说得具体点儿，只不过是出于国际大学排行榜上的压力，或者创建所谓“世界一流大学”的动力，那么，这就是在做一件自相矛盾的事，就是在南辕北辙地白费劲儿！在我看来，在当下的紧迫国际情势下，既然也只有指望在现代化的急行军中，借助于民族国家的强大整合力量，来既发展大学本身的事业，也转而反馈出更大的国际竞争力，那么，中国的大学——特别是它的顶尖大学——就不可避免地将要变形再变形，即使这种蜕变的历程充满阵痛和争议。由此说来，对于当今大学的实际操作者而言，与其去设定一个明知不能实现的空洞目标，倒不如实实在在地向公众讲明：至少从这个历史时期来看，这是我们必须承受的苦痛。

(四)

如果社会存在总要决定社会意识，那么校长本人的显赫身份，就必然要相当程度地限制他的大学论说——而且不难想象，这种难以摆脱的局限性，又主要会表现为以他那敏感的身份，一旦在直面公众的时候，往往就只能正面为主、多有回护、外交辞令、欲语又止。不过话说回来，也应当公允地承认，来自校长笔下的大学论说，仍然有相当的权威性，因为他原本就是干这个的，更富于实际的操作经验，把握的麻烦头绪也更加完整。正因为这样，最理想的情况就是，面对处于危机中的当代大学，我们的校长们既要勤于写作，又不要垄断这种写作，而只是甘当大学论说的领唱者之一。

美国大学的教授们，并没有因为其校长们的辛勤写作，而忘记或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正好相反，如果校长们面对那些忧患与困窘，还往往因为碍于什么而“有苦说不出”的话，那么，这些享有终身职庇护的教授们，无疑享有更多的言论自由，可以竹筒倒豆子地把问题摆在桌面。于是，这个知识群体突然兴奋地发现，大学这个他们最为熟悉的教育机构，正好提供了一个近在手边的文化案例，使自己可以充分发挥解析与批判的特长，从而不仅可以指望以自己的写作活动来改进身边的境遇，甚至还可以以此来报效大学所属的总体社会。正因为如此，就有了比尔·雷丁斯和大卫·科伯的这两本书，让我们且从前者谈起。